

目 录

序 言	1
分歧同每一个人都有关	3
我們曾到莫斯科去会談	6
我們的观点的基础	15
什么构成修正主义?	22
怎样进行爭取和平的斗争?	31
“核彈”有沒有改变了馬克思主义?	41
本世紀最大的謊言	47
和平和民族解放斗争	49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問題	58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64
結束語——在新西兰的任务	69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的小册子。由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两个重要的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文件——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的解释存在着某些分歧，所以有必要发行这本小册子。这两个宝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才产生的。它们一般地指出了朝着可靠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前进的道路。

新西兰共产党认为这两个文件具有重大的价值，它在这两个文件的进一步的帮助下发展了党纲——这就是我们拿到工作场所、拿到工厂和地方上去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政府不让我们在电台和电视节目里提出的那个纲领，在上次大选中资产阶级报纸实行封锁而不予报道的那个纲领。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两个文件的解释问题上产生这些分歧呢？我们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我们的看法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领会得出来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匆匆忙忙地得出来的，而是在对现在可以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有关整个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我们始终努力保持客观的态度，避免发表某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所耽迷的主观的激烈言论。我们的确曾希望这些分歧能在各国共产党的大家庭内部得到解决，而不要变成公开辩论的问题。如果过去在最初阶段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现在也就不需要发表这

本小册子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我們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就向有关各方面提出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被采纳。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抓住了这些分歧，加以歪曲和扩大，把它们作为阻挠全世界人民向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愈来愈强大的进军的一种办法。它们把这些分歧看作是有助于支撑它们垂死的帝国主义世界的某种东西。

所有这一切，你们想必已经从电台广播中听到过了，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了，从我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从《真相报》以及其他这一类的出版物上读过了。有人指责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工具，并且赞成把世界核战争作为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手段。

由于这一切，有必要使凡是愿意了解新西兰共产党看法的人，都能够通过我们自己所阐述的来了解，而不是通过那些一向不仅激烈地反对共产党人而且还激烈地反对一切富有战斗精神和进步人士的人们所说的来了解。

这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

分歧同每一个人都有关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可能会认为这与你毫不相干。也许你对于什么叫“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管是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的确是与你有关的。它同一切要求和平和进步的善良的人都有关系。争论中的那些问题将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前进，通过消灭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来建立世界和平的可靠基础；新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国家是不是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在把帝国主义从前门赶走以后，新殖民主义是不是会从后门再进来。

在新西兰，这场争论中用了许许多多深奥的字眼和论证，它们涉及通过“和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涉及人民群众在“核世界”中是否仍然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时间的因素是否已经使“领袖们”处于支配地位；还涉及帝国主义没落的时代里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的性质；涉及议会在这个“新时代”里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是早在我们本国的劳工运动初期就存在的问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很久，在核时代来到之前很久，就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在较早的时期，新西兰工党抛弃它原有的不多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渐进的不可避免性”（费边主义者曾经使用的术语）上面，寄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上面，寄托在“通过立法实现”社会主义上面。在这种过程中，除了在选举日拿铅笔写选票以外，人民群众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今天，在数届工党

政府执政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們所實現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大企业、壟断資本一天比一天更加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

在工业方面，在旧“赤色”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一三年衰落以后，劳工运动接受了劳資調解和仲裁就是前进的道路这种观念。他們指望資產階級的国家能“公平对待”工人。归根結蒂，資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唯一的真正的武器——不付出劳动力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当时被多数人拋棄了。

历史正在证明，这种态度是多么錯誤。工人們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工人对付壟断資本时，都不得不使用他們最后的武器。我們发现，已故的劳工联合会主席芬·帕·华尔希先生在去世以前曾說：

“事态发展的趋势已經证明工党领导人諾德迈耶先生在上次劳工联合会大会上所說的那番話是不真实的。他当时說階級斗争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今天我們沒有階級，事实上，工人、农民、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同大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你对此加以思考，你就会发现，我們对于新西兰当前这些问题的态度，同我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爭論问题的看法是以同样的原則为依据的。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会了解这两者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即使你觉得馬克思主义的名詞有些麻煩，也要記住馬克思主义是一門科学，它同其他各門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專門術語。还要記住这本小册子不仅是給新西兰人看的，它在国际上的发行量也会相当大。所以有許多问题必須比只在本地发行的书刊解釋得更充分一些。

如果記住了这些，那么，我們相信，考虑一下新西兰共产党領導的思想观点，就会在你的脑海中不仅消除資產階級宣傳的謊言，

而且也会消除那些应该更为有脑子的朋友们的谎言。这会帮助你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发展新西兰日益壮大的阶级斗争，使你明白在新西兰的政治战线和劳工斗争战线上的原则和策略。

我們會到莫斯科去會談

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新西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曾到莫斯科去就意識形态分歧問題举行兄弟般的會談。这个代表团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請前往的；这个代表团的成員包括团长、总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和团员、全国委员会主席默·威廉斯、政治委员会委員阿·奥斯特勒和政治委员会委員迪·沃尔夫。

你們大概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广播电台和报纸上曾經报道过。从那以后，許多非党的朋友曾經問道：“你們当时到莫斯科去究竟要談些什么？”我們想在这有限的篇幅內，像我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們說明的那样，尽可能清楚和确切地闡明我們的立場。

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扼要地說明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我們为什么会被邀請。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們在听取了作为兄弟党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党的乔·杰克逊所作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后，就作出了某些决定。这些决定不仅是根据关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进行情况的报告作出的，而且是根据一九六〇年年中以来我們所了解的一系列事件作出的。一九六〇年年中，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杰·滿生曾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出席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他發現自己是在出席一次匆匆忙忙召集的世界各国党的代表會議——这是在其他許多党事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由苏共领导召集的。在这次會議上有人企图造成对中

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政策的全面譴責。杰·滿生明智而正确地拒絕表明新西兰党的态度，他說，他的党沒有授权給他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来的目的純粹是参加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

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談的时候就指出，苏共領導事先沒有經過应有的集体討論就这样专断地单方面采取行动，企图使自己的意見得到贊同，是多么錯誤。苏共中央書記米·安·苏斯洛夫說：

“首先，讓我們談談你提出的关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問題。威尔科克斯同志，难道你不知道，召开那次會議的原因是中共領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起了公开的进攻嗎？难道你不知道，早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北京就出版了一本冠冕堂皇的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不仅由中国領導方面而且由形形色色的叛徒在全世界各地广为散发嗎？”

他們就是用这样的理由来为那官僚式的行徑辯护。然而，《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当时正被許多党作为党的学习材料。至于知道在羅馬尼亚代表大会之后将举行一次世界會議的問題，我們要向米·安·苏斯洛夫指出，当时許多党沒有派代表到布加勒斯特去——他們不知道——还有許多党沒有他們的中央領導核心出席，而如果要开一次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會議，他們的出席是必要的。在塔斯曼海对岸的我們的兄弟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根本沒有代表出席。事实上，澳大利亚共产党是事后才非常感激地得到了我党代表杰·滿生的报告。

因此，看来当时許多人都不知道議程上有举行世界各国党代表會議这一項。

正是这类事情促使新西兰共产党領導对苏共領導的許多做法

以批判的态度提出了疑問，最后并对他們的許多“新的”理論和实践同样也进行了批判的研究。

自然，这个問題在布加勒斯特并没有解决。这样一次匆匆忙忙召开的會議是解决不了这个問題的。因而，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正当地組織起来的世界各国党的會議，新西兰党正式派代表出席了这次會議。

但是，在苏共負責組織的这次會議上，我們也对苏共所采取的程序感到不滿。在这次會議上，正确地向所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文件草案，这个草案經過修改以后就成为由出席會議的所有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签署的八十一党声明。但是在会上也散发了苏联領導在布加勒斯特的声明。这是这次會議的正式文件之一。但是，中国党的答复却没有散发，而不得不从中国代表們那里取得。由于这种做法，出席會議的許多党的領導人甚至沒有看到这个文件，更談不上研究这个文件了。苏共答复中共的另一个声明也散发給全体与会者。但是，中国的答复却又沒有散发。

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客观地研究一切能够得到的事实和意見。但是并没有这样作。

更恶劣的是，当时（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苏共提供的材料中談到的关于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員甚至撤銷工业企业以及削減“援助”（注：一切物质“援助”都必須在以后付款）的原因，同苏联最近的材料——以及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們代表团說明的原因完全不同！苏斯洛夫對我們代表团說，中国領導拒絕接受技术援助和其他援助。但是，他所指的是一九六一年的事情——在中国已經有过以前这次經驗之后的事情。

我們不禁要为这些做法感到不安。

然后，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从諸如免費供应

面包(从一九六四年起)和廢除所得稅这样微小但是重要的措施着手的“二十年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我們曾經期望这个綱領将成为促进新西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一个重大因素。到今天,事实已經证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人們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突出的其他方面去了。資產階級报刊对此热烈欢迎并且开始在把这个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埋葬掉。

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甚至没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同志出席来闡明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人指望所有的代表都来譴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是非馬克思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當我們的代表将这些情况向我們党汇报之后,我們拒絕这样作,并要求召开另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會議。

我們当时就认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公开會議上,公然对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进行猛烈的攻击,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們认为,这不仅使資本主义世界的敌人感到高兴,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散布混乱,而且直接違反我們世界各国党关于应当如何处理我們运动中的分歧的决定。

我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沒有談到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的是非曲直問題。他們可以在适当的時間和地点在我們世界运动的內部来为自己講話。作为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他們有这种权利。

說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已經公开攻击了苏共领导,继而引用諸如《苏格兰人报》和其他資產階級報紙妄加猜測的文章来为自己辯解,这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这些妄加猜測的文章是一回事,資產階級利用苏共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党进行的公开譴責所发动的宣傳攻击,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我們队伍之外的所有的人和我們队伍

之內的許多人的心目中，這些攻擊成了人們注意的唯一的問題。而蘇共走向共產主義的綱領完全被人忘記了。

（的確，從現在已經公開的有關蘇聯的農業和工業的問題中，可能產生這樣的疑問：整個概念是否提出得為時過早。但是這個問題已超出了這本小冊子的論述範圍。）

要求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其他兄弟黨的代表譴責阿爾巴尼亞黨的領導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當時這些代表沒有被授權這樣做。這樣一件世界範圍的事，只能由一次世界性的會議來決定。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非常錯誤的，是違反我們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世界性的決議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是怎麼說的呢？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說：“會議參加者交換意見以後，得出了結論，認為在現代條件下，除了舉行領導人員的雙邊會談和相互交換情況以外，在必要時還應該舉行更廣泛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以便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場，協議為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共同目的而進行的共同鬥爭。”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聲明說：“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都是獨立的、平等的，它們從本國的具体條件出發，遵循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制定政策，並且相互支持。每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事業要獲得成功，需要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國際主義的同情支持。每個黨都對本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負責，都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負責。

“共產黨和工人黨根據需要舉行會議來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場，通過協商途徑得到一致的观点，協調在爭取共同目標的鬥爭中的共同行動。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这些做到了没有呢？我们说，没有。的确，他们也曾作过一些尝试要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举行会谈。但是，他们有没有根据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这个精神来作呢？

而实际上在这以后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呢？赫鲁晓夫代表苏共领导集体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下面这番话，而且从那时以来一再地重复这些话：

“如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珍视本国人民的利益和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他们真正希望同苏共、同所有兄弟党友好，他们就应当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回到在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中团结和密切合作的道路上来，回到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上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这样的：在举行双边性质的会谈以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必须声明，自己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都是错误的。在这里，苏共的态度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任何这种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既然话全说了，事情都做了，那么，按照苏共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在他们看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立场也正是十年或者十五年前苏联的立场。

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说，在斯大林时期，从三十年代起，布尔什维克党已经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了呢？

再来谈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为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苏共中央在给我们党的信中和在其他许多场合都曾经说：全世

界各国党都譴責阿尔巴尼亚领导是非馬克思主义的，搞分裂活动的，等等。事实决不是这样。所有各国党并不是个个都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我們并不想在这些問題上使你們生厌，但是我們认为这些問題是重要的。事实是，一切經驗都表明，錯誤的實踐是从不正确的理論中产生的，而且事实上它是以不正确的理論为根据的。

苏共領導人和其他党的某些領導人所作的大量的断言，使我們严重忧虑；我們认为，这些话不是以事实作根据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永远从事实出发，必須从已知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某人想望的情况出发。社会民主党人为了适应自己的目的而采取后一种做法，但是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在我們看来是不正确的态度。我們来引述一段話：——

“由于中国共产党領導人使他們同苏共、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尖銳化到极点，——”（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魯曉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講話）

不錯，对于中国領導人及其所做的事，他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們說什么“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不正确了。这是不确实的。人們說話如果离开了已知的事实——不論他們多么不喜欢这种事实——他們就开始踏上了危險的道路。

我們作为一个党，是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为依据的。对于我們來說，这些文件仍然是有效的，任何一个党也沒有任何权利来改变其方向或重点。只有通过我們世界运动的集体决定才能这样作。看来有許多党在独自修改这些文件，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些片段来适应他們自己的想法，使文件遭到歪曲。

我們认为，这样做的党当中包括苏共。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我們党的政治委员会才决定，不能照着

其他一些党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使下所做的那样譴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相反，我們要求为再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党的会议作准备，以便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决定来考虑全部有爭論的問題。宣言和声明中的有关部分，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述过了。我們建議，应当由最直接有关的方面举行双边会谈，以便为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創造适当的气氛，一种不会导致主观的攻击而会对一切問題作客观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估計的气氛。

因此，我們写了信給苏共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連串的信接踵而来。中国党同意我們的意見，他們自己也提出了有些相似的建議。后来，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議需要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但是出发点是他們的意識形态絲毫不成問題，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更有效地把他們的意識形态付諸实践。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对于同苏共领导举行会议是否能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仍然表示怀疑。

当苏共中央終於发出邀請要新西兰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討論分歧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这个建議恰好是在新西兰共产党一九六三年复活节举行代表大会之前来到的。

同时，新西兰共产党领导對我們世界运动的形势、对意識形态分歧的严重性进行了很多思考，这种分歧在各方面的活动中也像在理論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一样变得日益明显了。

我們得出了我們的結論，这个結論不是通过別人教我們怎样考虑問題而得出的，而是通过我們自己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斗争經驗、通过我們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而得出的。

我們断定（这种看法得到了我們党上次代表大会的批准），苏共领导在理論上和实践中都已經表明，他們基本上已經离开了馬

克思主义的观点，站到修正主义的立場上；如果不加以糾正，就会导致完全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他們也像从前的修正主义者一样还在使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

这个判断并不是輕易或愉快地作出来的。这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經過了一些痛心的时刻才作出来的，因为我們多少年来一直忠誠于苏共領導，这种忠誠差不多常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这不是反苏立場。苏联人民和他們的共产党必定会向共产主义前进，但是在尼·謝·赫魯曉夫的領導下，修正主义的滋长若得不到糾正就会起很大的阻碍作用。的确，在全世界範圍內，这种修正主义的影响已經很严重，起了阻碍作用，这是由于苏共对各国党有着特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列宁和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时代。

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据我們了解，在苏联还没有发表过，但是《紐約时报》在一九五六年非常迅速地在特別增刊上发表了）尽管不公平，它本来应当把人們认为苏共領導不会犯錯誤的观念永远打消掉了。从某些人今天的态度和言論看来，人們很可以問一問：“打消了沒有？”当然，任何相信哪个党或者哪个領導人不会犯錯誤的观念都是完全非馬克思主义的——道地的唯心論——但是这种观念还是存在着。

我們再說一遍：像我們目前这样在意識形态上同苏共領導持不同的意見，並沒有改变我們对偉大的苏联人民，对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成就的尊敬和热爱。

我們的观点的基础

除了对待兄弟党关系方面采取的工作方法和組織方法問題外，我們在哪些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呢？我們有不同意見的問題都是根本性的，天天影响着我們每一个人的。

在今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些字眼經常不断地出現。一些党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訂它們的政策，即：我們处在社会主义胜利和帝国主义衰落的新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事实上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变得过时了，或者不再像过去人們所理解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这特别适用于对待如下一些重大問題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态度：

——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

——国家的性质。

——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它在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意識形态方面的立場（以前大家都认为这是危险的修正主义傾向的例子，必須与之坚决斗争到底）。

——社会民主主义。

这些分歧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因此，客观地研究这些分歧就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客观的研究，是

为了澄清是非，在意识形态一致的原则基础上达到团结。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致则是通过以正确的辩证观点来研究一切有关的已知因素而取得的。如果认为，给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人们简单地扣上“教条主义者”的帽子就解决一切争论了，那是无益的。基本的重要出发点是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没有任何领导人、没有任何党能够说，他们在一切事情上和一切方面都永远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同志们会谈的时候，就认为在他们的态度中内在地存有这种观念。

当然，在这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上，我们党并不认为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出席莫斯科双边会谈的代表团，我们的政治委员会和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在重新考虑这整个问题的时候，更加相信在那些极端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发行这本小册子了。

我们党过去完全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当时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通过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我们党过去完全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结束时全体签署和发表的声明中再次作出的同样的决定。那项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决定是：修正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我们还毫不犹豫地說，事态发展证明，这个观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这个危险还大大地增长了。

列宁在世的时候是怎样谈论修正主义的呢？（我们要记住，列宁曾以他毕生大部分精力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以及当时组织良好的第二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的滋长进行斗争。）关于修正主义，伟大的列宁說：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

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我們认为，目前以尼·謝·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經站在这样的立場上。这样的形势势必深刻地影响其他許多党，并且把它們导向修正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是出乎意料的。我們再說一遍，由于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列宁的党”就有着广泛的影响，苏联党現在仍有极高的威信。

我們今天看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基本真理正在被篡改，或者被认为是过时了，我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情况毫无必要地給阶级敌人增加了力量。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肯定地导致公开的背叛，一如考茨基^①的修正主义在列宁时代所做过的那样。因此，新西兰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这种原則的立場。

我們和八十一党声明一样，也認識到教条主义的危險。但是今天教条主义的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一些党的领导中的那些人，他們不加批判地接受尼·謝·赫魯曉夫等人所說的一切，他們不让他们們的党员知道或有机会閱讀和研究各种不同的意見。不幸，在一些党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們党的领导已經尽我們的組織力量所及，向党员們介紹了各种观点。例如，我們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一份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双边会談上的发言、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发言全文以及我党总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在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向全国委员会會議所作

① 他是二十世紀初德国一个居重要地位的馬克思主义者。他背叛了德国工人阶级，支持德国皇帝的战争努力，咒罵俄国革命，墮落到全面支持資本主义的立場。与此同时，他却仍然高喊他的新理論是馬克思主义，而馬克思自己早先的論点則已經过时。

的報告。

在認識到教条主义的危險的同时，我們还不安地看到苏共領導不再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險了。米·安·苏斯洛夫說，“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許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們显然认为，在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問題上，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不再是正确的了。从下述的引語中就可以看出我們所讲的話的意思，

“苏共过去和現在都既同修正主义也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有些人却只片面地強調同修正主义斗争，而且有时还把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說成是‘修正主义’，从而給共产主义运动制造明显的混乱。……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問題的解决，是最严重的錯誤的根源。”

——《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編輯部文章

“在目前情况下，‘左傾’机会主义的危險并不小于修正主义”。

——鮑·尼·波諾馬廖夫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紀念列宁誕生九十三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警告說，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終不渝的斗争，它們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險。最近时期的事件发展表明了这些結論的远見性。……左傾机会主义……在目前其危險并不小于修正主义。”

——《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社論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忠实。苏共过去进行了、今后仍将进行反对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斗争。我們坚

定地遵循一九六〇年声明中的論点，这些論点指出，必須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左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綫上的斗爭。声明正确地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义，同时也指出必須进行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爭，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終不渝的斗爭，它們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險。

“我們党本着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利益，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爭，既反对右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險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傾机会主义。”

——引自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
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如果从这些引語来看，他們的態度还显得有些模稜两可的話，我們只能提醒你們讀一下列宁所讲过的关于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話。（見本书第 16—17 頁）

总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八十一党声明是这样說的：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今后繼續在两条战綫上进行坚决斗爭——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險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請客观地把这一段話同引自《真理报》社論的那段話或上述其他引語比較一下吧。

我們认为这是危險地改变了着重点。这样做，鼓舞了各地的修正主义者，鼓励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并且，一般地說，还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分裂。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誰要指出修正主义的傾向或者真实的理論根据，立即就被攻击为“教条主义”。明显

的事实是：世界各地的許多党的领导人都是根据“教条主义”、“左傾机会主义”是今天主要危險这种臆想行事的。

我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我們持相反的意見，这一点已經說明了。无論如何，这种臆想，或者說这种观点，无論在字句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是違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提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清楚地說明主要危險在哪里。有些人企图为这种方向上的改变辯解，說什么在我們生活的新时代里所产生的一些新因素改变了形势，这种辯解是毫无道理的。

自从一九六〇年我們經過長時間集体討論后通过決議以来，沒有出現新的主要因素。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指出我們生活的时代的性质，并且概述了我們运动前进的一般道路。新西兰共产党在言行中坚持遵守这一点，并且期望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这样做。

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呢？逐步放松对修正主义、右傾机会主义的打击，終將导致什么呢？我們认为，自从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这几年中，苏共领导一直在发生这种改变。这种趋势不仅导致錯誤地过分強調我們的世界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危險，把每一个批評都夸大为教条主义傾向，实际情况比这更恶劣。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修正主义思想的滋长和接受这种思想。这种趋势，从一九五六年不公正地批判斯大林，相当快地发展到把斯大林貶得“一文不值”，抹煞他的积极成就，硬說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虽然建設社会主义，却实行了“举世未聞的最殘酷的和血腥的专政”。

难道不正是在苏共二十大进行的这种攻击——我們已經說过它是不公正的——大大帮助了当时新西兰共产党內已經存在的修正主义的司各脫小宗派嗎？在他們不仅攻击党的政策和领导，而

且攻击关于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組織形式的公认的基本原则——党的章程和規則——的时候，《紐約时报》刊印的那个秘密报告不是成了他們的“聖經”嗎？

不論斯大林犯过什么錯誤，他不是修正主义者。因此，現代修正主义者在他逝世后同他发生誓不两立的冲突。“个人迷信”变成了一切麻煩、一切失敗的根源——不仅是苏联国内农业或其他方面失敗的根源，而且是一切地方一切錯誤和一切困难的根源。这一直是近年来圍繞所謂“个人迷信”問題而采取的态度，尽管事实上斯大林逝世越来越久远了！这种态度是什么問題也解决不了的，但是由于这种态度是从一个捏造的前提出发的，因此它会导致进一步的失敗和挫折。占主导地位的是歇斯底里，而不是辯证的、客观的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样就为修正主义的得势大开方便之門。

如果各共产党之間在某些理論問題方面产生了分歧（当然这种分歧会不时产生），那么显然要責怪中国人，因為他們奉行“对毛的迷信”。对朝鮮党及其领导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指責，同时还对其他的人进行影射。对爭論中的那些問題並沒有认真地加以考虑。占上风的是主观，而不是客观。

什么构成修正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重要方面，看看苏联共产党和一些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今天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对于这些方面是怎样說的和怎样做的。我們尽量說得簡短一些。

关于领导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問題，我們对这一点感到十分担心，即：今天在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对世界总的看法中，有人过多地强調了并不存在和平可能性的地区的和平可能性，而对其他方法則强調得不够。如果我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末說今天在存在着从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国家里有一种明确的起阻撓作用的影响，这难道不是事实嗎？在資本主义世界，这种影响到处侵襲我們各国党的革命核心，为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渗入开辟道路。

其次，我們还认为，有人过多地强調和信賴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物质进展对各国人民思想的影响，而对促成进步的真正核心，即資本主义地区、殖民地地区和新解放地区的群众积极性，則强調得不够。

在我們看来，进步的基础仍然是阶级斗争，非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战斗。我們同意，社会主义的胜利，苏共綱領的胜利实现等等是重要的，并且将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难道不应当把它們看成是次要的事情嗎？

我們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中英勇和胜利的紅軍曾經到达或者迫近

因而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影响的地区之外，历史上还没有和平过渡的第一个先例。然而我们知道，一些党实际上已经得出，或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是和平的道路。

对于这种严重的修正主义发展，我们认为目前的苏共领导起了促进作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概念一直在发展和扩大，直到造成了上述局面。就我们所知，苏共没有对这种发展提出过任何认真的批评，而最近却不断地对认为和平过渡在大部分非社会主义世界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种想法进行正面的攻击。

的确，认为我们非社会主义世界所有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骑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背上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受到了鼓励，从而损害了依靠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为了说明我们认为这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只简短地引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纲领中的一段话。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說：‘我们赞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是通过同其他国家进行战争的途径，而是用更完善的社会组织的范例，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通过为人们幸福安宁的生活创造一切条件，来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心灵的。”

如果这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有耐心，我们就可以袖手不动，因为主要因素将是阶级斗争已经获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能赢得资本主义的、非社会主义世界的群众的思想与心灵呢？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到那里去了呢？

我们认为，这样过分强调一个方面，可能是很危险的，并且可以导致错误的结论。但是，我们同时要着重指出，我们并不低估一

九一七年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极为重大的影响；也不低估从那时以来苏共领导、党员和苏联人民这些年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以及他们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作出的牺牲。

苏联的一位主要理论家波诺马廖夫同志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三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列宁主义把和平共处政策同进一步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结合起来。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强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保卫和平与在世界政治中维护和平共处的原则，根本不会削弱世界革命的进程，只会加速这个进程。正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从而继欧亚两洲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第三大洲——美洲获得了一个据点。”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意。但是古巴革命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通过古巴人民的武装斗争赢得胜利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附带说一句，我们了解，不幸的是，这场斗争既不是古巴人民社会党领导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中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支持。）在我们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所强调的，是和平共处的条件，而没有提及起作用的有效因素——武装斗争。阶级斗争是每个国家内的根本因素，在这种观点中看不到这个因素。

在我们党看来，在每个国家里，工人阶级政党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中，总是希望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但是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上，必须为非和平过渡作充分准备。这样，如果统治阶级拒绝接受人民的意志而对革命采取武装镇压，那么工人阶级政党就能狠狠地予以还击。坦白地说，我们认为，指望得到反动统治阶级完全而自愿赞同的和平过渡，这将不可避免地要挫伤人民的革命意

志和葬送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我们认为，以为统治阶级会自动交出政权的幻想是一种现代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简短地摘引几段：

“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它们所面临的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任务，提供新的可能性。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它们进行忘我的斗争，争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把这些事情拖延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鋒队认识到，他们自己肩负着为使本国人民摆脱资本压迫而斗争的主要重担，他们将在本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向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统治展开越来越有力的进攻。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锻炼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决战创造着条件。”

一九六〇年的声明把事情说得恰如其分。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根据本国的条件肩负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重担。声明如实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成就的影响所起的辅助作用。声明没有修改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群众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是在本国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的确，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对我们的代表团说过，苏联共产党主张根据当地的条件采取一切过渡的方式。别的人也的确多次谈到过这一点。但是，事实仍然是，一九六

〇年的大爭論是关于應該比一九五七年宣言更多地还是更少地強調和平的过渡方式問題。主張更多地強調这一点的观点，是由苏联共产党領導、特别是尼·謝·赫魯曉夫带头提出的。意味深长的是，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個党會議声明的初稿，只談到一种方式，即和平方式。別的党不得不进行斗争来把它修改成后来的样子。了解到这一切之后，人們不得不對他們的態度提出疑問。

其次，我們感到担心的是，我們认为有人未能看到，随着条件的变化，正在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風暴中心不可避免地已經轉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風暴的中心是在俄国和欧洲。今天难道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風暴的中心嗎？

这里，我們想从列宁的报告中摘录几句话，虽然不是直接适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恰当的。

“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屬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

“今后，我們苏維埃共和国将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圍，共同去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今天在我們世界运动中提出来关于資本家将和平地投降——不仅是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而作出让步，而是面对着議会的多数或者其他保证要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和平組織机构交出国家政权——的总的概念，簡直不适用于今天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它是否适用于別的地方，对这一点我們也表示怀疑。这个概念会产生什么結果呢？要末是接受这种概念，而使有效的斗争开展不起来，因

为整个状况要求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要末是这些国家的同志反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在许多国家里正在发生后面这种情况。

老实说，我们觉得，在当代世界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往往是更多地由被认为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前国家政策、而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来决定的。这一切的背后似乎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它们需要同帝国主义长期保持和平的关系，因此“不要去刺激野兽”。建议在某些尚未攻克的重要帝国主义堡垒里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那是非常“刺激人的”。因此，我们在听到有人大谈什么“明智的帝国主义者”正被说服接受和平投降的同时，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却在继续采取一成不变的强硬路线（很难说服越南南方人民相信帝国主义正在变得明智了！）。

这种理论家是不是始终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仍然各不相同，因此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呢？在新西兰，武装斗争目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必须运用其他的斗争形式。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任何其他的人都应该运用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方法，也决不能单凭我们自己的处境来作出判断。

在新西兰工人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总目标，在反对垄断资本、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和各种形式的日常的經濟和政治斗争中，给予积极的领导。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希望实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时时刻刻警惕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或者甚至是很可能的道路。我们党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高革命觉悟上，同时它本身必须为非和平的过渡作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随着条件的发展，当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成为新西兰的一个迫切问题时，如果统治阶级拒绝接受人民的意志并对革命进行

武装镇压的话，我们党就将随时狠狠地予以回击。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陷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得到反动统治阶级完全欣然赞同的和平过渡上的那种境地，那么它就将挫伤人民的革命热情和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早期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当年大卖力气干的那样。我们认为，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该重新研究一下那个时期。因为，难道不正是那些修正主义理论家，在世界规模上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造成分裂，结果才成立了第三国际？我们极其严肃地提出这一建议，因为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我们正面对着世界规模的分裂。我们希望我们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并避免这样的发展。

但是苏共中央的代表们就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怎么说的呢？现在把他们的话引述如下：

“我们完全不同意你们的如下论点：社会主义革命的風暴中心（如你们所称的）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南美。这不仅是对莫斯科各次会议文件的重新估价，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可能性缺乏信心的表现，是对世界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权缺乏信心的表现。如果風暴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那么，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在哪里呢？作为工人阶级的产物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又在哪里呢？我要重说一遍，你们的论点完全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愿意提醒你们看看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是怎么说的。我们时代的中心因素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些因素是争取和平、

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两个对立的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进行斗争的领域，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战场。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则是我们时代最巨大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你们要反对这个明显的事实呢？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决不会贬低你们所提到的那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是有助于了解那场斗争及其前景的真实情况。

“对我们时代的特点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使你们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进行修正。”

这确实是重要的谈话。我们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根本性的“修正”了。然而我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说：

“同志们，我们重说一遍，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认为有人未能看到，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暴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地转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风暴中心是在俄国和欧洲。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难道风暴中心不是在亚洲、东南亚和南美洲吗？”

同时也让我们指出，尼·谢·赫鲁晓夫本人讲过这样的话：

“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给予帝国主义以日益沉重的打击，有助于加强和平和加速人类的社会进步。目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中心。”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十五届

联大进行一般辩论时发表的讲话

我们只好让苏斯洛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他们自己去争个明白了。我们坚持我们所提出的主张。人们所注意的是薄弱环节，而今天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这些薄弱环节正是我们所指出的那些地

方。我們並沒有背離我們世界運動的總路線，我們並不否定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堡壘里的作用。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在蘇聯黨領導人的最近的文章和講話中，可以找到許多這種普遍的混亂和矛盾。我們要說，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我們的下述看法是正確的。我們的看法是：他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已經不再是把他們的觀點堅定地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而是雖然有時也滿口革命詞句，實際上卻已讓某些危險的修正主義思想滲透進去了。

馬克思主義者早已拋棄了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勢必首先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里實現的陳舊思想。歷史證明，進展是出現在帝國主義的最薄弱的環節上。在一九一七年，當時的許多修正主義者反對俄國革命，其理由是：由於“沙皇俄國的落後狀態”，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們借口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突破的“資本主義的優點”上，實際上是反對革命——反對社會主義。

我們的蘇聯同志們應當仔細地看看這一方面，而不要指責別人背離了總路線。

社會主義世界的巨大進展及其普遍影響絲毫也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為了繼續前進，我們應當指望資本主義世界較薄弱的地區正在戰鬥和組織起來的人們，並且向他們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我們應當，並且也能夠做到這一點，而絲毫不會削弱主要工業國家的鬥爭。這兩者是攜手並進的。

誰看不到這一點就是修正主義者。

怎样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今天，各国党都说它们同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关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策略主张的提法，这是就我们的党的活动来说的。大家都同意，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广大阶层的群众开展有效的斗争，即使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世界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争取和平的斗争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它涉及哪些问题时，分歧就开始产生了。

我们认为，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有些人没有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争取和平的斗争首先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战争的根源。在争取和平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将采用各种方法，千百万人将被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他们当时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行动不仅是为了争取和平，而且是针对着帝国主义的。

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不会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只局限于某些方面，不管这些方面是多么重要。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全面斗争，其中包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国家政策的基本特征的和平共处政策；包括吸引帝国主义世界的群众——通过他们的工会和政治团体，并且通过新的形式——参加有组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包括自然而然地扩大到殖民地和解放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和平运动。

但是是否应该到此为止呢？有些人似乎是这样想的。我们怀疑，依靠群众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斗争的重要基础；在尽可能广

泛的基础上把他們吸引进来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进行有效斗争的目标。这个运动似乎往往依靠吸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参加并依靠他們来领导，它的組織也是以这些人为基础的。当然，他們可以起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同样地，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間就有关和平的各种問題所达成的協議是有价值的，但是与群众对于爭取和平的觉悟的提高，从而意識到必須采取有組織的行动这种情况相比，却是次要的。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随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大会的报告，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上述做法上的缺陷是一清二楚的。根据我們的观点，更糟糕的是这个事实，即作为爭取世界和平斗争重要組成部分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不是被忽視了就是遭到反对。但是我們要說，这是爭取世界和平斗争的重要部分。

我們认为，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如我們在前面說过的——是由于沒有能够認識到，实质上，爭取和平的斗争是在一切战綫上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沒有能够認識到，在我們的新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改变；沒有能够認識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

真正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者是沒有的。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矛盾的。我們要問，帝国主义头子有时候不是錯誤地被划为这一类人么？例如，艾森豪威尔曾被赫魯曉夫称为“爱好和平的人”。此后，对于肯尼迪也說了些类似的話，毫無疑問，这种話不久也将应用到約翰逊身上。

在这里，我們必須說，我們认为，今天我們的世界运动在这个和其他重要方面的某些分歧，是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

提出的那些概念所产生的；后来许多人把这些概念这样地加以发展，以致当我们估计我们新时代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着重点是不是有点紊乱了。这种“新”是真的新呢，还是一种新形式的修正主义？指责我们提出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那种说法是正确的吗？还是只不过是掩盖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真正严重的倒退行为的外衣？

因此我们要问，我们所说的和平共处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它有变成各人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东西的危险。我们要问，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实行和平共处的时候和地方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其本身就意味着可靠的世界和平，这种想法是不是不正确？我们援引一两段苏联的言论来说明使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和平与和平共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停战，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共处，它建立在相互放棄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在当前条件下，已经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争取到一个直到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它们的外交政策总路线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作为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所宣布的口号的实际表现；争取和平的行

动是各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鮑·尼·波諾馬廖夫在一九六二年
《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座談会
文章：《革命运动中的若干問題》

“和平共处不仅仅意味着沒有战争或某种暫时的、靠不住的休战。它首先是相互拒絕使用武装部队作为解决国与国間爭端的手段。”

——多列士在一九六二年《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
杂志座談会文章：《偉大革命变革的时代》

（把多列士的言論也列在里面是为了表明和平共处的概念是多么各种各样。）

上面这些引語都不是罕見的。还可以列举許多其他的話來說明，关于所說的那种和平共处，究竟我們是已經获得了呢，还是在获得的过程中；是意味着持久性质的和平呢，还是不是持久性质的和平等等，是不明确的。

我們要問，为什么这样不明确？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說得很清楚。我們引述如下：

“和平共处的路綫是动員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綫。

“各国間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棄階級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間的階級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階級斗争、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階級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問題的核心难道不是这个事实，即和平共处为帝国主义世界

中的群众作为爭取和平的一支力量而发生作用，为发展階級斗争和为扩大民族解放运动，創造有利条件嗎？

列宁是否曾經从“相互”的意思考虑問題呢？我們认为，列宁的概念是，共产党人必須努力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但是他有沒有忽視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各种矛盾依然繼續存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各壟断集团之間的矛盾也依然繼續存在？在我們看来，列宁认为，不能忽視这些矛盾，同时共产党人必須积极利用这些矛盾来随时随地促进革命斗争。尽管社会主义世界发展壮大，列宁看到的那些矛盾仍然存在着并且起着作用。至于我們引述的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所談关于和平共处的真正目的——难道不是往往被放在十分次要的地位嗎？难道不是存在着这种幻想，认为維持世界和平、爭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重要因素，是同帝国主义政府达成協議而不是在各地把群众組織起来采取行动嗎？我們认为这种幻想是存在的。

我們的意見是：和平共处的概念决不能在实际上变成压制殖民地和資本主义世界革命力量的政策，唯恐这种革命力量会扰乱同帝国主义关系上所希望的“平靜”时期。因为，这样一來，人們就开始走上投降的道路，并利用修正主义的論点来为他們改变了的态度辯解。

我們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會議作出的決議中的如下論点：

“帝国主义陣营日益瘋狂地从事軍备竞赛、奉行欺騙人民的政策、侵略和国际挑畔的政策，用这些办法来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

的确是这樣。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仍然是軍备的力量；核武

器仍然存在；在越南南方，某种程度上在老撾、朝鮮和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挑釁行动和战争。在我们谈论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正視这些事实。事实是：这样的世界将是一个帝国主义連同它目前那样为非作歹的力量都不再存在的世界。

也許再引述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会有助于人們正确地看待事物：——

“苏联将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取得新的胜利。殖民主义体系将完全崩潰。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将占絕對的优势。

“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实际上，今天，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某些共产党的政策，难道不是建立在认为上述一切已經实现——虽然帝国主义肯定不承认这一点——这样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嗎？就和平共处的正确政策來說，我們认为，必須使我們的脚跟站在稳固的基础上。

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国家政策的基础。我們也同意不可能有其他別的。但是讓我們把列宁的著作牢記在心。讓我們記住，社会主义体系生产的工业品还没有占世界工业品的一半以上，殖民主义体系还没有最后崩潰，而新殖民主义却在一天天滋长。

就我們的世界范围的运动而論，就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际上奉行的政策而論，如果我們不記住这些，那么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

一种政策就会导向冒险主义的行动和不可避免的退却。

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提一下近来使新西兰党深感不安的、同苏联政府政策有关的一些事情。前些时候我们听到许多关于“戴维营精神”的谈论，虽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领导人和社会主义领导人之间根本不能有什么精神上的一致。我们并不是说有时进行最高级谈判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当时，对那次谈判的提法，可能在群众中造成这样的幻想，以为是“领导人”而不是人民能够得出结果和实现持久和平。这样的事情涣散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斗志，特别是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新西兰，工党政客一直在鼓励劳动人民让领导去包办一切。

还有，不久以前，我们相信而且鼓励大家相信，苏联的政策意味着他们决不会第一个恢复核试验。突然，像个晴天霹靂，他们宣布他们将重新开始一系列核试验。当时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并表示同意，然而新西兰的一般工人却不能理解。由于苏联政府没有预先说明被迫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从而大大损害了和平运动。大多数工人终于说：苏联和美国——“让你们两家去遭殃吧”。这是事实。

人们提出的论据之一是这个事实，即法国正在进行试验。我们党支持这种论点，但是现在，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之后，对于法国不久将用比前一个时期还要先进的武器在南太平洋进行试验一事，又能指望我们说些什么呢？对新西兰人民来说，这种试验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它就在我们的后院进行。然而，实际上，它所表明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仅在使我们免受继续存在的核战争威胁方面，而且甚至在使我们免受大气层试验的威胁方面，都是完全无效的。难道指望我们说，法帝国主义是新西兰和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避而不谈原子毁灭的主要威

胁来自美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嗎？我們会走向何处呢？

在古巴，曾經否认建立了導彈基地，可是突然又出現这样的情况，導彈基地已經建立了，并且是必要的。难道指望我們把这样的事情巧辯过去嗎？在苏联对“帝国主义是紙老虎”这一概念加以責难之后，我們知道有人就在帝国主义战术上最强大的地方把導彈基地建立起来。自然，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把導彈基地撤除，可是当时还把这种做法說成是和平的偉大胜利。

但是，我們不能不問一句：起初为什么要把它們放到那里去呢？——特别是因为現在我們所說，苏联反正可以从自己的国境穩穩地击中美国的要害。

順便說一句，我們也許可以說，关于今天帝国主义的处境，我們同意它是“垂死的和腐朽的資本主义”和“泥足巨人”。換句話說，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它是虛弱的，虽然从战术上來說，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古巴和導彈問題上，它可能是很强大的。因此，从战术上來說，必須根据当前斗争的情况和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当退却是不可避免时，为什么硬要去攻打坚强的据点呢？

現在談談德国問題和柏林問題。苏联政府曾多少次約定了同东德簽訂和約的日期——可是每次都沒有下文。有时候看来簽訂条約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又好像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很严重的，因为現在一般人（至少在我們国家的一般人）并不相信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苏联政府今天是說話算数的。信任已經丧失了。在过去并不是这样的，那时不管人們的政治見解如何，他們知道苏联說話算数，說到做到。在資本主义世界里，現在只有信念坚定的人还相信这一点，但是不可避免的趋向是：这种信念坚定的人将越来越少。

在世界形势沒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而突然改变了政策，这种做法的最近一个例子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

事实是，現在被說成是和平事业的如此重大的胜利和标志着沒有武器或战争的世界的时代开始来临的这项条约，它同美国和英国在前些时候所提出的建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时苏联曾正确地拒绝了那个建议，认为那是一个企图掩盖帝国主义者战争中
使用核武器这一实际阴谋的骗局。

我們发表了苏联早些时候拒绝英美建议的消息。現在我們該怎么說呢？是参加大合唱，叫喊那是对和平的一大贡献，从而同他們和我們在先前說过的話自相矛盾嗎？

这里略引苏联领导过去就帝国主义关于部分禁止核試驗問題的建議所說过的一些話。尼·謝·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在最高苏維埃第四次會議的报告中說：“我們想再次強調指出，苏联坚决主張：必須停止在空中、地上、地下和 underwater 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試驗。如果仅仅通过一項只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試驗的決議，那么，这将会打破各国人民对彻底停止試驗的希望。”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尼·謝·赫魯曉夫在接見《紐約時報》評論員苏茲貝格時說：

“如果軍备竞赛繼續进行，軍事工业繼續全力生产越来越多的核武器，停止試驗有什么用？”

“我要說，这有点等于欺騙輿論，使人們放松警惕。人們將以为已經为阻止战争做了一些工作，而实际上什么也沒有做，相反地，軍事机器將繼續全力开动。

“此外，肯尼迪和麦克米倫的建議一点沒有談到停止地下試驗爆炸和所謂的用于和平目的的爆炸……”

“因此，肯尼迪总统和麦克米倫首相提出的建議的目的不在于保证各国的安全，而在于追求宣傳目的来把責任推給別人，同时自己却悄悄地繼續实行儲存热核武器和准备对社会

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老政策。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局势，关心我们自己的安全。”

我们要问：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除非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可能认为他们储存的不会因时间过久而变坏的核武器已经够多了！

这一切前进和后退，以及突然改变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寻找思想根源。而且，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遵循一种原则上稳定、策略上灵活的对待政策的坚定马克思主义路线。事实上，事情已变得如此捉摸不定，以致我们党不得不问问自己，它是否知道这一切将导致什么后果。我们要问：这是否同修正主义渗入总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有很明显的关系？我们认为是有关系的。这一切肯定要在世界工人运动的队伍和一切进步人士中间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核彈”有沒有改变了馬克思主义？

現在讓我們来研究一下最重要的方面，即今天我們世界运动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个問題。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呢，还是反对核战争和爭取和平？

我們认为，前者是目标，而后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我們很快就会堕落到和平主义的立場上去；就永远不会正視現代武器发展的真正含义；就会得出这样的結論，认为核武器等等已經改变了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概念。这样我們就会說，由于“核彈”的出現，战争已經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战争的根源不再是产生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

換句話說，我們就会开始說，已經发生的变化，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現代战争的性质及其根源的基本学說过时了。这种說法同认为战争是由于个別人的一时的念头或者一些事件所引起并没有社会根源的唯心主义立場只有一步之差。照这样推論下去，我們就会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而否认階級斗争的繼續存在及其重要性。

这里，除了最近十年来苏联的外交政策突然反复改变之外，还出現了两个重要的事态。一个是依靠群众作为在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且認識到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反帝斗争。另一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的問題。

我們再說一遍：我們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

呢，还是反对核战争和争取和平？我們已經說清楚，我們认为，前者是目标，后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

苏共中央的代表們是怎样回答我們代表团的呢？他們說：

“你們知道，防止热核战争的問題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世界共产党人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說：‘各国共产党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坦白地說，你們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这同你們的讲话差得很远。你們贬低了争取和平斗争的作用，但是八十一党声明說，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是当代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首先是世界工人阶级，担负着防止世界核战争的重大責任。争取和平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策略問題，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基础之一。八十一党声明說，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剝削和貧困，以及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消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在于就在現时代使人类摆脱世界战争的慘禍。”

我們的态度是經典的馬克思主义态度。虽然我們毫不低估核战争的危險，但是我們认为这种态度仍然是正确的。我們不认为放棄或者逐漸取消我們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会对防止核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有任何帮助。除非我們隱蔽到外层空間去，否則无法逃得那么远来使这种政策見效！

另一方面，苏共中央所提出的观点，难道不是使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有許多空子可钻嗎？在他們的影响下，我們运动的战略目标正在失去重要意义，而其他事情——事实上是当前行动的重要目标——却变得和主要目标一样重要了。

現在讓我們来檢查一下我們认为帝国主义者拥有核武器这一情况对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难道从长远来讲群众已經不再是强有力的因素了嗎？从下面引述的《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

月七日的編輯部文章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我們要說明的問題，

“不能用老的尺度來對待現代戰爭。世界戰爭如果不能防止，立刻就會變成熱核戰爭，會造成千百萬人的死亡和破壞大量物質財富，會使整個整個的國家遭到毀滅。那些不考慮現代戰爭的後果，對核武器估計不足，或干脆不去考慮它，而把它當作對人們來說是次要的東西的人，是犯了大錯誤。”

我們知道，核武器具有可怕的破壞力，如果爆發核戰爭，那將是一場大悲劇。我們這些在新西蘭的人認為，必須把群眾組織起來防止核戰爭，我們歡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有助於防止核戰爭的任何行動。例如，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國政府呼喚世界各國政府舉行會議，來尋找途徑和辦法，不僅禁止一切核試驗，而且銷毀現在儲存的核武器、撤除一切基地和停止製造一切核武器，這是一個強有力的主張，可以把人們團結起來，展開鬥爭反對我國政府支持美帝國主義政策的政策，我國政府曾說過，不管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對與不對”都予以支持。

我黨政治委員會一九六二年決議中所表達的我們的觀點是：爭取和平的鬥爭是一種廣泛的鬥爭，它包含着各種因素。我們已經指出過，這個鬥爭從根本上說是在殖民地世界，在受到新殖民主義威脅的地區，在革命形勢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和在帝國主義世界本身，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認為，這場鬥爭是以群眾及其戰鬥組織為基礎的。在同帝國主義領導人舉行的最高級談判中取得成果，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僅僅是暫時的，因為帝國主義仍然存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不能局限在反對核戰爭方面，但是我們認識到核戰爭的危險，我們要求徹底禁止一切核武器。這就是說，不僅禁止核試驗，而且要禁止製造核武器和禁止儲存核武器。這就是說，要銷毀現在儲存的核武器。

那么，这是不是說，我們應該像某些共产党現在所說的那樣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已經過時而必須修正呢？難道因為核武器的发展，我們就得採取根本上是和平主義的立場么？難道我們現在能說這些武器已經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能說現在由於核威脅，任何正義的戰爭都不能進行，因而就沒有正義的戰爭這類事情了么？

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不是就將導致採取否定的態度而認為：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正義的戰爭——社会主义國家保卫自己的戰爭、革命的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再也不能進行了么？那末帝國主義只要以“投核彈”相威脅，我們就會退却。

我們一旦拋棄了必須竭盡全力防止帝國主義的非正義戰爭的思想，開始認為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防止一切戰爭，那末，我們很快就會嫉視任何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武裝鬥爭的開展，以及一切民族解放戰爭。認為列寧主義關於戰爭性質的概念已經過時的新理論，把這些事情從日程上一筆勾銷了。這正是那些抱有這種觀點的人目前所力圖做到的，雖然他們在實踐中還不能完全把這一點付諸實施，而且將來也無法做到。

我們黨正致力於迫使帝國主義者接受禁止核武器和禁止帝國主義手中的一切武器，但是我們沒有忽視，這必須經過革命鬥爭。我們記得，儘管帝國主義進行了“核訛詐”，而且就在帝國主義掌握的核彈的陰影下，通過武裝鬥爭，在建立一個社会主义的越南北方、社会主义的朝鮮北方和社会主义的古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從另一方面來說，帝國主義在哪一個地方容許過和平地建立起一個社会主义國家呢？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除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最初的几年在苏军到达或者有压倒的影响的一些地方以外。

我們已經說过，今天在东南亚、南美、南非和許多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地方，存在使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可能性——只要我們的运动不在帝国主义核讹詐的威胁面前屈服。

但是，一旦让帝国主义看出，如果他們用核彈来进行威胁，我們的运动就会从我們的革命斗争中退却，那末他們就会大規模地进行这种威胁。他們必然会采取这种策略，因此，可以看到，这种恐惧，归根結蒂会把我們的运动引向什么地方去。

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它們的本性，是不会对別人发善心的，也不会諒解別人的恐惧的。事实上它們利用这种恐惧。他們也不会听取关于人类福利的議論。在我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在帝国主义沒落的时期里，在我們看来，最大的危險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全面退却。

我們也觉得奇怪的是：在关于帝国主义拥有核彈这一情况的种种新的談論中，社会主义世界也掌握了核彈这一事实似乎却被忽視了。幸而帝国主义倒沒有忽視这一点。阻止帝国主义“扔核彈”的这种威懾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保证帝国主义在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不敢搞核讹詐的强有力的因素。

我們认为，把核武器問題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动力是錯誤的。阶级斗争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核战争的前景多么可怕，阶级斗争并没有被消灭。我們运动的斗争决不能局限于促使帝国主义奉行和平政策、不使用核武器，因为要有可靠的和平，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請看，即使在要迫使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政策的时候，有些党在实际上也已經撇开了在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群众的作用。

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运动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垄断资本，由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以此为起点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时代的主要策略集中点则是防止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防止核战争。

本世紀最大的謊言

因此，我們要談談人們正確地稱之為“本世紀的謊言”的言論，那就是不斷地指責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張通過核戰爭在人类的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代表團在莫斯科會堅定地說，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宣傳，而且還有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蘇共領導人在散布這種想法，從而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使有些工人得出社會主義的中國希望戰爭這樣的結論。許多人一向認為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希望戰爭，而現在他們不僅聽到帝國主義者說，而且還聽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希望戰爭的，從而播下了不團結和失望的種子。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或者能夠讀一讀中國人自己究竟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講的。據我們了解，中國黨的領導在他們的綱領或政策中從未這樣講過。事實上，他們一向主張以對全世界群眾的信心為基礎的積極的和平政策。他們親自肯定地對新西蘭共產黨領導說，他們不主張通過核戰爭實現共產主義。他們所說的只是，如果帝國主義者發動這樣一次戰爭，並不是一切都完了，人類遭受嚴重的損失後，將會生存下來，社會主義終將勝利。事實上，一九六〇年八十一黨聲明講的和這一樣！

但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們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日在莫斯科回答上述的話時，再一次地說：

“中國同志頑固地宣傳這樣一種思想：通過一次熱核戰

爭，在帝国主义毀灭的廢墟上，世界人民将会創造更好一千倍的文明和建設一个真正美好的生活。他們所說的是：消灭帝国主义，而用不着管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毀灭；归根結蒂战争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而且中国同志正企图把我們的整个运动导向这个結論！他們怀着这样的目的宣傳战争并不是那么可怕。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在莫斯科提出过这样的論点：如果人类毀灭一半，那也沒有什么可怕，这将埋葬帝国主义。但是你們不想一想，所有的新西兰人民可能在这一半人类里嗎？那末由誰来在你們的土地上創造美好的未来呢？問問你們的工人們，他們是否同意。”

中国人沒有讲过这样的話。我們知道毛澤东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实际上是怎样讲的。我們党的政治委员会委員阿·奧斯特勒当时作为新西兰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世界共产党會議。

为什么总是歪曲地引述別人的話呢？肯定是一个人理亏的时候才歪曲地引述旁人的話。这不是任何自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应当耽迷的一种习惯。

这給我們的世界运动造成极大的損害。

和平和民族解放斗争

我們坚持这一主張,即:对于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
方面,对于它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的斗争中以及在为使社会
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鋪平道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須給予充
分的考虑。

对于我們这些在新西兰的人來說,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問題。
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的門徑卷土重来
的企图的失敗和东南亚从民族解放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为新
西兰的进步打开了大門。这使我国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壟断資本
的枷鎖,特别是摆脱美国政策的章魚般的控制,正是美国的政策使
我們处于东南亚条約組織的最前綫,并且带来了时时刻刻都存在
的被卷入战争的危險。

我們已經指出,就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而言,我們认为对于反
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起的极关重要的作用沒有給以足够
的注意。还有某些其他方面,特别是关系到最近苏共政策的一些
方面,使我們深感不安。对于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和南美的傀儡政
府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对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印度等国家里重
新发展,或者对于过去一年中在伊拉克发生的更可悲的事件,沒有
一个人能感到高兴。

在我們看来,下述引語似乎概括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
般态度,这些引語虽然很长,但却說明問題:

“民族解放革命不是由于外界影响或压力引起的。它們

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直接结果。但是任何这种革命要取得成功，有利的国际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结合新的和更为有利的国际局势来看过去十年中这一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它在这时已经形成——正在发展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步伐的主要因素。

“今天，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它的成员给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支持，是民族解放革命获得成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

“这丝毫也不会贬低殖民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人民没有表现出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没有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最终目的，任何革命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但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大多数新发展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都较少，并且缺乏进行现代战争的手段和经验。

“相反，它们的帝国主义敌手们却既有武器又有经验。特别是它们有导弹，而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却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武器。

“虽然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并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一个年轻的国家的独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首先是苏联的支持，是保障独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苏联是唯一拥有制止任何侵略者的军事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每当帝国主义对这一或另一年轻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苏联的行动总能对它们起到使其神志清醒的影响——帝

国主义者深知，苏联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它的军事力量来制止侵略（然后举出了关于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例子）。

“苏联的军事力量是如此显赫，以致有时只需要苏联政府发表一纸声明，便能促使西方国家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例如，当苏联政府说，它将支持印度把果阿、第乌和达曼从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西方关于要对印度进行制裁，包括进行军事制裁的一切谈论都马上消声匿迹了（作者说在西伊里安问题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军事力量来自经济力量。这着重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对所有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国家的价值。这是一个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纲领。这个纲领实现以后就会使苏联在经济上具有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

“这样一来，苏联便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归根结蒂将使帝国主义没有能力为推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政府而发动侵略。”

“因此，成功地执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是符合一切争取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利益的，也是符合这种解放运动的一切忠诚的战士的利益的。”

——引自一九六三年第二十六期《新时代》杂志所载尤里·鲍奇卡廖夫的文章：《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

实际上，这篇文章无非是说，发动反对帝国主义者们的革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们有武器又有经验。至于如上面所引述的关于争取群众的“心灵”，使他們想望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又是苏联，又是它所取得的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日益增长的威力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不是人民的积极性，不是在斗

爭中的群众。

我們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它极容易不自觉地导致大国沙文主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是其内容却仍然是可以感觉到的。

列宁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我們从他所著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提綱》一文中，引述如下的几段話：

“占全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二十世紀初叶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爆发革命后，已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苏維埃政权，使这些群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他們成了世界政治和用革命行动摧毁帝国主义事业中的积极因素，但欧美那批有教养的市僧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領袖在內，却頑固地无視这一点。”

我們知道，由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英勇努力，苏联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发展了新武器。但是，我們不相信有任何事情能使得人民的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事实上，在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方面，他們所說的和所做的却正是这样一些东西。

我們对像老撾和越南这样一些斗争激烈的地区的局势也感到不滿意。在南越，存在着把斗争推进到使社会主义取得新的胜利——扩大社会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把和平共处的政策运用到这种局势中来，是否意味着由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作出的一些官方的安排，社会主义在目前就必须局限在它現存的疆界之內呢？在研究了老撾等国家內的事态和人們对这些国家的

政策之后，我們认为实际上事情正变得非常接近于这种情况。

难道某些共产党不是往往把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好像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就会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好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新解放地区不起作用，而我們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现在就不存在了吗？

我們认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结果是为新殖民主义敞开大门。人們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以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的态度来处理。列宁說：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別注意以下各点：

.....

“第五、必須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內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組織起来，并且認識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別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結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說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实行的欺騙政策，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們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各苏維埃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屬国和弱小民族別无生路。”

是否曾經鼓勵印度黨去貫徹執行列寧的路綫呢？他們最近圍繞“保衛祖國”這個口號所提出的概念使我們不能抱有這種看法。

讓我們暫時先不考慮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我們注意到，有人經常說必須在解放了的落後國家里建立工業，以便有足夠強大的無產階級基礎來把鬥爭推進到社會主義的鬥爭。無論我們從哪一方面來看，在我們看來他們似乎是在提出某種理由來說明為什麼在目前不能考慮在新的地區爭取社會主義的新勝利。難道馬克思主義在過去曾經提出過否定非工業國家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理論嗎？這種進展現在主要正是在這些地區發生的。最近的一個例子，大概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北方。

今天，帝國主義正在提供“援助”方面同蘇聯和其他國家進行競爭，就解放了的地區而言，它還是做得相當成功的。例如在印度，美援正在迅速增加。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是真正的援助，帝國主義的援助只不過是為了掩飾將來的剝削的一種外衣，促使在印度和諸如安哥拉、莫三鼻給等一些非洲國家內的新殖民地化得到發展，並且越來越猖狂地試圖在其他地方，如在印度尼西亞這樣重要的國家里進行這種滲透。但是，要解決這種問題並不能依靠許多修正主義的新理論，而是要依靠列寧在下面的引語中所提出的辦法：

“如果我們不背叛社會主義，那就**應當**支持反對我們主要敵人即大國資產階級的**任何**起義，只要這不是反動階級的起義。如果我們拒絕支持被兼併地區的起義，那在客觀上我們就是兼併者。正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在這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时代，無產階級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併地區的起義，以便明天或者同時進攻被這種起義削弱的‘大’國資產階級。”

——列寧：《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只有通过这种做法，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前进的可能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会比较迅速地消除。

我们的代表团是否得到了任何有力的答复，可以使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怀疑消除，使我们相信他们目前政策的基础是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呢？答复是：没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我们的代表团是这样说的：

“首先，你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工人运动对立起来。你们说民族解放运动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最重大的作用。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巨大的革命重要性，但是它不能在世界革命进程和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你们指责我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没有足够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对于这个指责，我们已经一再驳斥过从中国共产党口中听到的这个指责了。

“我们的党纲对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纲领说，新解放国家人民的力量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力量在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中的团结，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最大因素。这个反映亿万人类的意志和力量的和平阵线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以及世界解放运动。

“你们谈到某些中心，东南亚和南美。你们痛心注意到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发展。我们有同感。

“沙文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增长是同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直接有关的。高士同志在一九六〇年的会议上说过，‘……它助长了这个国家里的反共宣传，这种歇斯底里是被用来反对这个国家的——这里讲的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你们，中国领导在印一中冲突中的

政策，表明它从和平共处原则——包括万隆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后退了。它对印度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之不得不面临极端困难的处境。而你们却硬说是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危害了斗争中的人民。

“不是别人，而正是苏联给予了民族解放和反帝斗争以全面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斗争中所使用的是苏联武器。许多新解放的国家是用苏联的援助和武器来保卫自己对付帝国主义的。一旦需要，苏联就毫不犹豫地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古巴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之一。”

在东南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可能性就这样被忽视了，而且也没有客观地研究一下像印度这样的政府到底在多长时间內仍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政府。苏联领导人断言，印度是对的，而人民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侵略者。但是，亚洲或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这样说过，而其中大部分国家还是非共产主义国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任何侵略的迹象。

请原谅，我们想问一下，尽管他们说了那些漂亮话，就他们对印度的政策而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顺便提一下，苏共的代表们在同我们的代表团的会谈中，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提到过新殖民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发现，这种事态发展很难同他们的公开的政策性言论相吻合。因为提到这种威胁会使人们再次同帝国主义正面对抗。

所有这一切导向何处？不仅导致我们的运动出现世界性分裂的危险，而且导致这样一种局面：今天再也没有人能谈论磐石般的社会主义世界并且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了。我们发现，有人对印度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印度本来就从来就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

足够的援助(附带說一句,我們的代表团在参加莫斯科双边会談后回国途中曾在德里着陆,在那里的机場上我們看到一架美国空軍的飞机就停在苏联提供的一架运兵和轰炸用的飞机旁边),但是却拒絕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任何援助。这些人談論什么維護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們却拒絕對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

是的,我們必須解决这个問題。而唯一的办法是坚定不移地以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問題

爭取比較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的群众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縛的問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問題——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些人特别关心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我们是采取根据长期經驗得出的看法——我們終生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尽管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無論在哪里，还没有任何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已經存在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地区的情况下，修正主义再次提出这种主張；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問題的时候，意識形态問題是无关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包含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有工人阶级的群众基础，它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这也是今天如此公开地表现出来的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新爱情的基础。）

列宁曾經称新西兰为“第二国际的天堂”。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在我国出現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当时的几届自由党—工党政府执行的政策中出現。所以，就这个問題而論，我們有过一段漫长的历史。

我們认为，我們当前所关心的是，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理論已經把馬克思和列宁所闡述的关于如何对待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經典理論当作过时的或者在新条件下不适用的东西而摒棄了。这就在我們的世界运动內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及其

理論和實踐這個重大問題上形成了這樣一種普遍的感覺，使人們忽視思想問題的重要性，並且開始把社會民主主義說成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或者是不需要在思想上作任何根本改變就可以被爭取過來，成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一支有用的同盟軍。

這不僅是危險的，使人們忽視我們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而且不可避免地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滲入我們自己的隊伍打開方便之門。那樣我們就會成為左翼工黨的“鞭策派”，而不能看到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仍然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種形式，它有時像右翼社會民主黨一樣對階級敵人有用。有時，它在出賣工人利益方面甚至比右翼社會民主黨更有用，因為它用比較有戰鬥性的言詞來掩蓋它的反動行徑。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關於社會民主黨的性質的話，今天仍然是正確的。我們扼要地援引如下：

“事實上，‘工會運動的政治組織’或‘政治表現’這兩個概念是錯誤的。

“當然，工黨大部分是由工人組成的。但是，一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只有根據後者，才能確定這個黨是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

“從這個唯一正確的標準來看，工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雖然它是由工人組成的，但是領導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最壞的反革命分子。”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發言

但是，今天不是有許多人忽視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是資產階級政黨這個主要因素的危險嗎？在我們看來，甚至連蘇共

綱領也沒有提到這一點。蘇共綱領說：

“歷史經驗表明了社會民主主義既在意識形態上也在政治上的破產。即使在改良主義政黨執政的時候，它們也只限於進行一些局部的、不觸及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改革。反共主義把社會改良主義引入了思想政治的絕境。這是社會民主主義發生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蘇共綱領

並不是反共主義把社會改良主義引入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絕境。反共主義只是一種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思想觀點的必然結果。

我們認為，這會造成把在這個問題上的戰術與目標混淆起來的危險。我們的戰術是盡一切可能同受社會民主黨影響的群眾聯合行動，而我們的目標則是從勞動人民的腦海中清除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使他們樹立真正的工人階級觀點，了解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正確性，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群眾自覺地支持我們共產黨。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就是敞開大門讓修正主義進來，並取消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共產黨。

我們認為，在新西蘭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路線，並結合我國情況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反對壟斷資本展開更為有效的鬥爭的時候，我們所碰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對工人思想的影響。對我們來說，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是起點。而在這方面，這種思想立即就起了阻礙作用。它使人們接受現狀，認為進行鬥爭是沒有希望的，人們只需依賴工黨領袖就可以了，而工黨領袖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他們本身就是壟斷資本的工具。這種思想造成了一種觀念，即“領袖們會安排的”，群眾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全部作用只是每隔三年乖乖地投一次票而已。

这就是我們在新西兰所面临的情况。

在我們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階級思潮，是維護帝国主义、即壟断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的一根重要支柱。列宁早就指出过，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階級政党的变种。

在工人階級运动的日常斗争中以及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受他們影响的工人群众一道，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但是，与此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須同社会民主党严格而清楚地划清思想界綫，并且努力把正直的工人階級分子爭取过来，使这些人能够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了解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开展坚持不懈的階級斗争来反对資本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新西兰，作为资产階級思想的变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本身正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我們并不想制造一种幻想，以为在群众当中正在形成一种牢固地建立在斗争的基础上的工人階級思想观点。情况并非如此，但是，相信新西兰工党下次当选后将会解决工人的問題这种看法却正在迅速消失。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所以能有影响，往往是依靠大多数产业工人认为工党比其他资产階級政党要好一点这样一种不牢靠的情况。

我們认为，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沒落的时代，这种发展是合乎邏輯的。但是，我們担心，这一方面的情况并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明确地被指出来。相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正在改变的幻想似乎正在日益滋长。

列宁是怎样闡明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队伍中产生的呢？他认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列宁大体上是这样說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資本主义有可能在不严重影响当时不断增长的利潤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情况下，在各主要工业国家里造

成一个“工人貴族”。列宁說事实上，由此所造成的工业化国家內阶级斗争的削弱，使他們在那个阶段的所有盈亏賬上得到了盈余。

我們知道，这并不是像某些資本主义的辯護士企图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是什么資本主义在使人民群众得到較高的生活水平。不是的，那个时期是他們迅速扩展的殖民帝国进行最殘酷、最严重的剝削的时期。但是，在現在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占有障地的国家里，当时是有可能通过向劳工运动领导人吹捧夸贊，給他們荣誉，給他們拿干薪的差事，对最有能力的一部分工人，則在牺牲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情况下讓他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等等，来收买劳工运动的。統治阶级的这种手法，在我們現在称之为“西方”的整个地区以及当时的英帝国的某些部分，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普遍采用的。

列宁在《打着別人的旗帜》一文中这样写道：

“拿占领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來說吧。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

“这在經濟上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潤和特权，其次无疑的是意味着极少数小資产者以及高級職員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等能够得到这些‘大块蛋糕’的一点碎屑。

“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在殖民地和特权的利益当中‘享用’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就有过，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承认过和指出过。

“但是在当时，只有英国才有这种現象，而随着欧洲所有的資本主义大国先后占领大量的殖民地，随着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現象。”

我們談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我們看來，下面這種看法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果說產生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因是如同列寧所論述的那樣，那必然就意味着，現在，由於帝國主義在沒落，它從事剝削活動的範圍在縮小，可以進入的新地區很少，而且由於帝國主義的世界危機也因而日益加劇，所以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工人隊伍中的物質基礎也正在消失。

我們必須充分掌握住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正在衰亡的思想這一觀念，並且認清它的種種含義。這樣，我們各黨在這些國家里的領導作用將明顯地表現出來，並將有可能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運用靈活的策略。如果我們不明确這一點，那就會作出不必要的讓步，就會產生幻想，認為必要的統一戰綫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就會認為拋棄社會主義目標的一切偽裝的工黨領袖，不再是老板的工具，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工具。

我們認為，今天在我們的世界運動中正是沒有明确這一點。我們希望能作出更加深刻的分析。

不幸，我們去莫斯科的代表團所表達的上述這些看法沒有得到任何贊同，雖然在會談結束時大家同意有必要更深刻地分析有關當前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並且表示歡迎我們參加作這種分析。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无疑，这个国家里许多积极关心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人过去一直认为，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下所发生的情况，对新西兰来说，是一个有点学院味道的问题。

我们自己曾经一度陷入这个陷阱。但是，事实上，结果证明它不但对我们的整个世界运动，而且特别是对我们新西兰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南斯拉夫，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中看到了一个背离社会主义的成就而开倒车的例子。之所以出现这种开倒车的现象，是因为他们把人们从列宁的许多著作中可以读到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修正主义者的理论付诸实行了。

因此，我们认为，批判地审查而不是欢迎回到我们的队伍来，才是我们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采取的态度。

我们认为，自从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而一九六〇年的会议极其严厉地谴责了它。他们可能进行了一些改良来消除南斯拉夫国内的某些弊病，但是，这些改良是在修正主义总的范围内进行的。如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同我们刚刚谈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是个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尼·谢·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初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代表苏共表示的目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是违反一九六〇年声明的。

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在保持南斯拉夫現存的“社会主义”和鼓勵其发展的借口下，朝着欢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归队的方向走了第一步。如果要作任何修改的話，都需要經過世界性的集体討論这一点則被忽視了。

我們將引用我們党簽了字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中的一段話。这个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問題是这样說的：

“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脫离了社会主义陣营，使它依賴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們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結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我們并不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們认为另外有些人却是改变了。他們不再支持八十一党声明。我們要問，如果不經過集体研究就可以加以改变的話，那么作出决定又有什么用呢？

同时，我們要強調指出，我們絕對不应当在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的問題上发生思想混乱。这种关

系的存在是正确的。但是我們說的是共产党人之間的关系，我們觉得，看到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而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却断絕了关系，这是令人非常不安的。

尼·謝·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德国統一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說：“南斯拉夫領導人在他們的言論中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还說：“南斯拉夫領導集团的綱領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許許多多修正主义綱領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領導人不是走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

我們同意尼·謝·赫魯曉夫当时的态度。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論根本上是沿着通往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倒退，难道不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問題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仍然坚持他們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三种力量的概念，那就是說他們繼續置身于社会主义陣营之外。正如尼·謝·赫魯曉夫过去曾經清楚說明的，这是背叛，那么，为什么現在却不是背叛了呢？

南斯拉夫領導人认为，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領導作用应当縮小到次要地位，必須避免企业由国家集中管理，不应当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們的这种观点改变了嗎？沒有改变。今天，他們可能試圖糾正分散化所引起的某些重大弊病，但是他們只是作些拙劣的修补工作而已。我們重复一遍，他們的修正主义理論仍然沒有变，其結果也仍然沒有变——在工业上，存在着一种新的自由企业家，他們事实上是按照同资本主义公司的經理一样的原則办事的；在农村，小块私有土地正落入数目越来越少的一些人的手中。

我們认为，南斯拉夫新宪法只是证明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問題的結論是正确的。我們不能认为米·安·苏斯洛夫对我們的代表团所說的下述这番話是有力的答复：

“关于我們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我們的印象是，在这个問題上，你們的了解是錯誤的——关于你（維·乔·威尔科克斯）在北京所談的关于資本主义复辟的講話。我們希望，更好地了解事实会使你們回到較正确的立場上来。南斯拉夫领导人过去曾經犯了重大錯誤，我們曾經十分正当地本着有原則的方式批評了他們。但是，我們必須正視这个事实：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們有一个共产党，我們的国际义务是，不仅仅无休止地重复你們就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領導人的所講的話，而是应当尽我們的最大力量，帮助他們克服他們的錯誤，恢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作用。不能說，我們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是違反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然而，当这种行动給予南斯拉夫和全世界的修正主义以更大鼓励的时候，人們就可以說这些行动是違反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了。我們过去就曾經說过这种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結果。我們現在仍然持这样的看法！

另一方面，人們可以問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不采取这种态度呢？他們在給新西兰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信中說过，他們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它的領導犯了“錯誤”。那么，为什么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呢？

苏联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同意修正主义是我們的世界运动中的主要危險，他們当时对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划为修正主义者並沒有疑慮。人們只能认为，他們在上述講話中所提到的錯誤是指修正

主义的錯誤。为什么可以同修正主义者紧紧握手以幫助他們，而拒絕同那些被认为是教条主义者的人紧紧握手或幫助他們呢？說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罵人和誹謗人”太甚了，这并没有回答問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着謾罵和誹謗苏共领导的突出的紀錄，他們絲毫沒有道过歉，也沒有承认过錯誤。

这不仅是我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多次提到的在原則和实践問題上的混乱的又一个例证，而且是同修正主义日益亲近的例证。难道不是这样嗎？

我們的話就說到这儿吧。

結束語——在新西兰的任务

上面我們試圖簡要說明我們對今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着分歧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方面的觀點。我們沒有特別挑出蘇共領導來談，因為其他許多人也有類似的觀點。我們之所以不能不談談蘇共領導的觀點，是因為他們的觀點具有普遍的廣泛影響。

可是，我們不能接受去年八月在莫斯科舉行的雙邊會談中蘇斯洛夫向我們代表團表明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這一看法，當時，蘇斯洛夫代表蘇共中央說：

“最後，我們請你們注意下述情況。一向對兄弟的新西蘭共產黨抱有兄弟般的同情態度的蘇共中央，對新西蘭共產黨領導目前的立場感到不安。我們認為，你們黨由於背棄宣言和聲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由於疏遠了共產黨兄弟大家庭，正在走上很可能給你們黨造成嚴重損害的錯誤道路。

“我們認為，坦率地向你們指出，你們現在所持的態度可能給你們黨、給新西蘭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帶來多麼大的損害，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

“我們認為，我們兩黨——蘇共和新共——之間的分歧還沒有達到無法彌補的地步。而且，也沒有客觀原因妨礙蘇共和新共恢復兄弟關係。如果新共領導表現出對當前事態有所

了解的話，如果它設法爭取到足夠的力量來維護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現在所奉行的唯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話，它就會勝任它在當代複雜形勢中所面臨的重大任務。要這樣做，現在為時還不算太晚。

“就我們來說，我們黨將盡一切力量來保持一向標誌着我們兩黨之間的关系的兄弟情誼和誠意，這種关系首先符合新西蘭共產黨的利益、蘇聯共產黨的利益、你們國家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各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

坦白地說，這番話很像是說：“要同意我們的觀點，否則你們就不再是兄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一部分了。”但是，任何一個黨都沒有權力作出這樣的決定。人們把這種言論稱作“揮舞指揮棒”。普通的新西蘭人，無論是在共產黨內，還是在共產黨外，都不大可能接受這種態度。我們確信，蘇共領導終於會認識到這種態度是多麼不對，因而在同其他兄弟黨舉行任何討論時將不採取這種態度。

我們認為，對一些問題有意見分歧，並不排斥兄弟关系。事實上，我們同我們的代表團在莫斯科所會見的蘇共主要代表的关系中也沒有發生任何這樣的破裂。而且，下述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我們兩黨雙邊會談結束時，蘇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和我們的代表團簽署了一項聯合聲明，其中還提到將進行進一步考慮和討論。這是非常受人歡迎的。目前，事情就處於這種情況。

在新西蘭，共產黨面臨着艱巨的任務。正是在這裡，在圍繞着我們自己的黨綱展開的活動中，在反對國際壟斷資本越來越厲害的入侵的鬥爭中，在反對日益擴大的美帝國主義的影響的鬥爭中，在爭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西蘭的鬥爭中，實踐將證明我們的

意見是正确的。

如果我們全神貫注于在国外进行爭論，以致忽略了我們在國內的經常活動，那將是致命的錯誤。我們的工作就在新西蘭這里。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政策帶到工業企業、輪船、礦山和農場中去。我們必須爭取到對這個政策的支持，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影響越來越大。

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的衰落給我們黨、給新西蘭工人階級和所有進步人士不斷帶來新的問題。但是，它也為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機會。

我們這裡反對像殖民制糖公司這樣分布很廣的壟斷資本——這種壟斷資本的活動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水平——的直接鬥爭表明，需要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正確的思想認識。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這樣一些方面，如我們爭取改善社會保險的鬥爭，爭取較好的教育和改善設備的鬥爭，爭取把稅收負擔加在大企業身上和減輕工人、農民和其他收入少的人的負擔的鬥爭。

我們在為新西蘭工會運動制定一項更富有鬥爭性的政策而努力，這種努力牽涉到工會運動是朝着階級調和的方向發展，還是依靠階級鬥爭作為主要因素的問題。如果我們看不清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我們就會開始認為，我們的“國家”——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而事實上，它保護的卻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它對被剝削者不可能是“公平的”。

這就是我們在這本小冊子里所扼要指出的意識形態對我們有直接影響的方面。

此外，我們還要竭力使那些認為工黨能解決問題的工人和其

他的人認識到，不管有多少工人參加它，工黨今天也是一個支持大企業的政黨，因此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工人的政黨。我們的這種努力是這場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政策，不是人數或名稱。**這也就是我們對待意識形態問題的態度的最重要之點！**

我們爭取和平的立場也是這種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按照我們的立場，我們說，為了爭取可靠的和平，我們必須努力消滅帝國主義，而決不幫助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本身包含着現代戰爭的根源。

這樣就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對我們新西蘭人確實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正因為這些情況，而且正因為我們的理由是正大光明的，所以我們直言無諱。新西蘭共產黨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廣泛的兄弟關係的一部分，不僅有權，而且也有責任表明它的觀點。這是我們為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利益和為了我們新西蘭運動本身的前途的利益所應盡的義務。

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如果發生分歧，應當採用辯證方法來解決。如果照這樣做，那麼就會出現以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新的了解和新的團結。這就是新西蘭共產黨在表明它的觀點時所抱的期望。如果採取這種態度的話，目前的“爭論”事實上會加強我們的整個國際運動。今天，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創造性地把它們運用到一九六四年的世界局勢中去。

因此，就我們運動在世界範圍取得的進展來說，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瞻望未來。我們可以對我們自己的綱領充滿信心，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圍繞它積極展開活動，那末，新西蘭共產黨的影

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就会在工人和受国际壟断資本剝削的一切人中間日益扩大。

工党领导人在一九三六年宣告来到的虛假的“紅色”曙光已經消失。但是，我們可以像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地相信，真正的紅色曙光正在到来，新西兰工人将在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社会主义前进。